

# 清代新疆通志的殿军

## ——《新疆图志》及其整理本评介

周燕玲

**提要：**《新疆图志》是清代新疆地区的最后一部通志，宣统三年（1911）由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组织修纂完成。《新疆图志》（整理本）于2015年12月出版，除了精益求精的校勘之外，整理团队还编制了全书的人名、地名索引，在为使用者提供了便利同时，极大地发挥了这部清代新疆通志集大成之著的价值。

**关键词：**《新疆图志》 整理本 评介

2015年12月，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主持整理的《新疆图志》正文3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荣获2016年度国家古籍整理一等奖。2017年5月，配置了人名、地名索引和《新疆全省舆地图》的整理本1函5册全部出齐，2019年又喜获中国出版协会主办的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可以预见，这部精益求精的新疆古籍整理作品的问世，必将在有关中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中起到重要的文献作用。以下即对《新疆图志》的成书、内容，以及整理本的特点略加述评。

### 一 王树枏与《新疆图志》修纂

《新疆图志》是有关清代新疆地区的最后一部地方通志，由时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枏组织纂修。王树枏（1851—1936），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河北新城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四川青神、甘肃中卫等地知县。光绪三十二年四月，钦受新疆布政使，宣统三年离任。民国时期曾任清史馆总纂，是一位在晚清民国文化建设上具有重要贡献的学者。

王树枏有感于新疆地处边远，民族众多，而前代汉语史志文献匮乏，遂组织同人，发愿修纂了《新疆图志》。《陶庐老人随年录》光绪三年条下载：

新疆僻处中国西偏，蒙、哈、缠回种类庞杂，通知汉人文字者甚稀，自开辟以来，文献寥寥，无可征信。时桐城方绎民希孟、醴泉宋芝洞伯鲁随长庚将军出关，霍邱裴伯谦景福谪戍新疆，皆方闻博雅之士。余于是创修《新疆图志》，设局于藩署之西偏，志例皆余手定，分门纂辑。余无他嗜好，公余之暇，借此消遣而已。<sup>①</sup>

以上文字记载了他创建新疆通志局、修纂《新疆图志》的过程。至宣统三年，修纂告成。该书《凡例》称“是书始事于己酉春三月，而卒事于辛亥冬十二月”<sup>②</sup>，参与编纂者有钟镛、裴景福、宋伯鲁、段永恩、王学曾、刘文龙等旅新文士及官员70余人。而作为主持者的王树枏，

① 王树枏：《陶庐老人随年录》，中华书局，2007年，第63页。

② 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页。

也亲自参加撰写及修订工作,《陶庐老人随年录》该年又记:

《新疆图志》开局以来,余自撰成《国界志》八卷、《山脉志》六卷、《兵事志》二卷、《访古录》二卷、《新疆小正》二卷、《礼俗志》一卷、《道路志》四卷、《土壤表》一卷。其《建置志》,则余仿《汉·地志》创撰一卷,而属同年宋子顿伯鲁照式续成之。《实业志》则余创撰森林、渔业二门,属门人钟镛笙叔续成,又经余一一改定润色,始成定本。<sup>①</sup>

宣统三年十二月,《新疆图志》全书首次由新疆通志局排印付梓。凡116卷,200余万字。分为“建置”“国界”“天章”“藩部”“职官”“实业”“赋税”“食货”“祀典”“学校”“民政”“礼俗”“军制”“物候”“交涉”“山脉”“土壤”“水道”“沟渠”“道路”“古迹”“金石”“艺文”“奏议”“名宦”“武功”“忠节”“人物”“兵事”29门,“溯古迄今,广事收罗,章目分明”<sup>②</sup>。

《新疆图志》的编纂完成,成为王树枏在新疆布政使任上最重要的文化建树之一,也成为清代新疆通志的总结。吴丰培曾赞誉此书“问世以后得好评,成为一部新疆省规格化的志书”<sup>③</sup>。当代研究者们公认“《新疆图志》是研究新疆地方史的必读之书”<sup>④</sup>。

## 二 《新疆图志》的内容特点与价值

在《新疆图志》成书之前,清代有关新疆地区的通志共有3种,分别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奉敕纂修、乾隆四十七年定稿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嘉庆十二年(1807)祁韵士纂成的《伊犁总统事略》;嘉庆二十五年徐松修纂、道光元年(1821)由道光皇帝赐名的《新疆识略》。而作为清代新疆通志的殿军,《新疆图志》能够取长补短、博采众家之长,不仅在内容涵盖面上居清代以往新疆志书之首,其守正、趋新的编纂理念也都超越了其他同类著作。

首先,《新疆图志》的编纂方式在承袭传统通志体例的基础上,扩充了分志叙述的门类。如上文所述,在分设的29个门类中,除传统志书中所常见的职官志、食货志、古迹志、艺文志等以外,尤其注意反映当时的新形势,并吸取最新研究成果,首次加入了国界志、实业志、交涉志、民政志、土壤志,使得《新疆图志》作为现存清代新疆方志当中分类最为合理、介绍最为全面的通志。

其次,在编纂过程中,非常重视舆图的作用。“是书图志并重,不敢偏重于志而略于图。非欲固为繁缛,因幅员广漠,延袤四百五十余万方里,使无图以总揽大纲,则读者有前得后忘之弊;是用不厌求详,以豁阅者之目。”<sup>⑤</sup>在编纂伊始,王树枏就派专员赴南疆进行实地测绘。在此基础上,全书精绘了80幅地图,包括《新疆全省舆地图》58幅、《新疆实业盐产邮政电线道里图》22幅,这些地图清晰反映了清末新疆区域地理、交通乃至行政建制的状况。与此

① 王树枏:《陶庐老人随年录》,第73页。

② 吴丰培:《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

③ 吴丰培:《吴丰培边事题跋集》,第213页。

④ 魏长洪:《〈新疆图志〉浅谈》,《新疆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2期。

⑤ 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凡例》,第1页。

同时，以藩部志、祀典志、职官志、道路志为代表，编纂者们还采用了图表并重的形式，“来一目了然地反映新疆事务的纷繁内容和递进资料”，在中国古代地方志编纂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sup>①</sup>

再次，对于史料的采摭与运用，《新疆图志》也力求完备详赡。《新疆图志》卷首的引用书目中罗列了50种参考书，而据研究者考察，全书中实际引用的史料多达600余种。<sup>②</sup>对于所使用的材料，编纂者采取了无征不信的取舍标准。“各志记载攸关，凡得之前书者，必详举原书，附考于下；虽采取之各府厅州乡土志及各项公牒者，亦必标题清晰。非仅求不掠人美，盖必如是而来历分明，近足以征信当时，远足备后来考证也。”<sup>③</sup>1902年，新疆地方政府呼应清廷“广育人才，振兴新政”的倡导，编纂各府厅州县乡土志共计42种。这些都为《新疆图志》的编纂提供了史料基础。朱玉麒曾以《新疆图志》为主要依据，辑录出已经散佚的《疏附乡土志》志文近万字之多。<sup>④</sup>且在“详今略古”观念的指引下，《新疆图志》还广泛利用实地采访、地方政府保存的档案史料等来扩充著作史料来源，在保留大量原始资料的同时，也使得该书内容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彰显出其文献征存的意义。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新疆图志》全新的编纂理念。《新疆图志》修纂于新疆建省之后，成书之际又适逢辛亥革命爆发。主持者王树枏本人既具有传统学术的深厚渊源，亦留心时事，思想开放，与同时期的国外学者们如伯希和、马达汉、莫理循等人多有往来与交流。伯希和曾亲见王树枏编纂《新疆图志》的过程，认为王树枏是“一位大学者。……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文士”<sup>⑤</sup>，“一名很开放的思想家”<sup>⑥</sup>。王树枏给马达汉留下很好的印象，他还给马达汉赠送了附有题词的著作，马达汉赞誉王树枏“天资聪明和有学识”<sup>⑦</sup>。莫理循也曾提及《新疆图志》的编纂并称赞王树枏说：“布政使王树枏是直隶人，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正在编辑一部关于新疆的大辞典，包括地域、人民、物产、风俗和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已经出版了9卷，其他内容正在紧张地编辑之中。”<sup>⑧</sup>在这种内外交织的全新时代与文化背景之下，《新疆图志》的编纂自然而然地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与转型的需要，体现出为民生立志的观念和晚清新政革命强国富民的理想。

《新疆图志》的进步观念，可以根据朱玉麒专就《新疆图志》“学校”一门进行研究的结论作出分析。文章认为，该分志最大的创新之处是对新政以来新疆地区基础教育建设的翔实记载，并且鲜明地表达了对民族地区教育成败的反思和对策。<sup>⑨</sup>这正是对王树枏新式编纂理念的最好体现。同时，《新疆图志》的编纂者们也重视吸收西方学说与材料，以及注重实地考察和测量的科学方法，以弥补传统志书编纂中的偏颇。例如在“实业”“食货”“交涉”等分志当中，就常可以看到对同时期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科学资料以及相关著述的引用，这些都成为晚清方志编纂进

① 参见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整理前言》，第10页。

② 参见史明文：《〈新疆图志〉版本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3—44页。

③ 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凡例》，第1页。

④ 参见朱玉麒：《〈疏附乡土志〉辑佚初稿》，《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⑤ [法]伯希和等著，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18页。

⑥ [法]伯希和等著，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第36页。

⑦ [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260页。

⑧ [澳]莫理循著，窦坤译：《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33页。

⑨ 参见朱玉麒：《清代新疆官办民族教育的政府反思》，《西域研究》2013年第1期。

步性和科学性的典型。<sup>①</sup>

《新疆图志》的编纂仅历时4年，加之编纂人员众多、参引书目庞杂，造成某些部分存在引文错误、知识错误、重复叙述的缺陷。如吴丰培所指出《艺文志》中将《西征录》作者“王大枢”误记为“王元枢”的错误。王大枢于乾隆末年因事遣戍伊犁，在彼时的伊犁地区享有一定文名，著有《西征录》8卷。<sup>②</sup>比王大枢稍后谪至伊犁的洪亮吉曾在其《天山客话》中记载：“怀宁王孝廉元枢以事谪戍伊犁，著《西征录》六册，亦间有可采。”<sup>③</sup>将著者误作“王元枢”，“《新疆图志·艺文志》因之而延其误，并作六卷”<sup>④</sup>。由此可窥见此书错误类型之一斑。

尽管如此，这部皇皇巨著内容与结构的体大思精，使它至今仍是研究西域历史文化与西北历史地理的必备著作，具有相较于行纪资料的破碎性、档案文献的片段性、实录方略类资料的晦涩性、其他公私史志著述的片面性之外，更为宏大、完整、贯通的优越性，堪称是一部有关新疆地区的百科全书。从王广荣《〈新疆图志〉综述》<sup>⑤</sup>、戴良佐《王树相与〈新疆图志〉》<sup>⑥</sup>对该书特点的总体概括，到侯德仁《〈新疆图志〉史学价值论析》等专题文章<sup>⑦</sup>，学界对这部著作的研究逐渐深入，甚至还成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热门选题。<sup>⑧</sup>这些成果，对于《新疆图志》的推介都不无裨益。

### 三 《新疆图志》整理本特点刍议

《新疆图志》的整理在学界尚属首次。《新疆图志》整理本并非仅是对原刻本的简单校勘和文字录入，而是做了版本甄别比勘、图志合编、索引制作等大量工作，从而使得整理本相较于原来的多种刻本、抄本而言，具有了若干新的优点。

第一，整理本是迄今最为完备的《新疆图志》全本。在此整理本出版之前，《新疆图志》全帙有3种版本：一是在该书成书之当年的宣统三年十二月，新疆通志局在乌鲁木齐利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志局本”。二是民国12年（1923），由罗振玉、王国维发起的东方学会推荐，在天津重印的“东方学会”本。三是天津图书馆馆藏的，原民国实业家、方志收藏家任凤苞旧藏的抄本。此抄本被认为是在《新疆图志》成书之后送交宪政编查馆供审查的样本，因以黄色绸缎包装，故称为“黄册本”。比起其他两个版本，“黄册本”中保留了由王学曾纂修的4卷《补编》、“礼俗图”“物候图”，以及“历代沿革图”“钦差大臣沙克都林札布会同俄官裴克托尔米德恩斯克依勘分喀什噶尔属边界图”“英游历官高宝尔绘英俄私分全帕暨英俄交界山川形势图”等丰富的地图。此外，该本所保留的新疆巡抚袁大化为每一分志所撰写的序言也最完整。

① 参见王树相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整理前言》，第6—7页。

② 参见吴华峰、周燕玲：《“天山渔者”王大枢的遣戍生涯与诗文创作》，《西域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洪亮吉：《伊犁日记·天山客话·外家纪闻》，光绪三年（1877）刊本。

④ 吴丰培：《吴丰培边事题跋集》，第204页。

⑤ 王广荣：《〈新疆图志〉综述》，《新疆地方志通讯》1988年第2期。

⑥ 参见戴良佐：《王树相与〈新疆图志〉》，《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

⑦ 参见侯德仁：《〈新疆图志〉史学价值论析》，《求是学刊》2004年第5期。

⑧ 参见史明文：《〈新疆图志〉版本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赵剑锋：《〈新疆图志〉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蒋小莉：《〈新疆图志·建置制〉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整理本综合了现有3种《新疆图志》全本进行标点校勘，以“东方学会”本为底本，“新疆通志局”本作为校本，全面解决刻本中的错讹。并增补了“黄册本”中袁大化的分志序言及4卷补遗，使得之前深藏宛委的罕见图籍重见天日，从而得到一个相对完善的《新疆图志》排印本。在整理过程中，点校者还逐一核对了《新疆图志》原书中的引文，通过校勘记的形式纠正原著中的史实错误。

第二，整理本首次将原书分离的图、志合刊。如前所述，《新疆图志》在编纂过程中，曾绘制了数量可观的地图。由于制作困难，在宣统元年（1909），58幅《新疆全省舆地图》在汉口先期印制后，制作为单页片一袋发行。待东方学会重版《新疆图志》时，仍然是将58幅《新疆全省舆地图》和22幅《新疆实业盐产邮政电线道里图》分册印制。这一作法致使《新疆图志》原刊本长期图、志分离，使得“图志”之称名不副实。

在重新整理的过程中，整理者影印了国家图书馆藏东方学会版彩印本《新疆全省舆地图》，与文字部分配套另册出版，将22幅黑白《新疆实业盐产邮政电线道里图》插入正文相应内容，以求图文对应，最大限度地恢复了该书图、志并存的原貌。

第三，整理本专门编制了人名与地名索引，并单另出版。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丰富的民族语言带来了人名和地名称谓的大量音译用词，造成大量同人同地异名和异人异地同称现象。为了方便阅读，整理者通过专名线的方式在正文中进行了正名处理，同时通过索引的编制，对《新疆图志》中涉及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相关的人名与地名加以收录，将异人异地的同名现象做出区分，不仅最大限度地方便了读者的查阅，提高了研究者利用此书的效率，同时也为翻译名称的研究和统计提供了便利。<sup>①</sup>

《新疆图志》在成书伊始就受人瞩目。在编纂过程中，一些分志著者也曾在全书印行前后，将所著分志的名称稍加修改后单册刊印。如“官书局”本《新疆兵事志》《新疆国界志》《新疆山脉志》；海棠仙馆本《新疆建置志》；关中丛书本《新疆建置志》《西疆备乘》等，甚至王树枏自己也以个人名义刊印了《新疆小正》《新疆访古录》等。这些单行本的出现，无疑加速了该书的传播与影响。但是，受到当时印刷和编纂条件的限制，它的历史和现实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新疆图志》整理本的完成距该著成书已有百余年之久。从2009年启动整理，这项工作历时8年，甚至比此书本身的编纂时间还要长一倍。10年前，朱玉麒还在新疆师范大学任职，《新疆图志》整理本也是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西域文库”系列丛书所推出的重要成果之一。作为古籍整理著作的精品工程，整理者团队凝聚其间的校勘、编辑、索引工作，必定会扩大这部著作的影响、推动学界对《新疆图志》的研究与利用，也能够使这部清代新疆通志的集大成之著最大限度发挥出它的价值，为西域文史研究的进步与提升拓宽视野。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周全

<sup>①</sup> 参见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整理前言》，第16页。